

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郭熙保 胡汉昌

摘要: 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与西方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评价标准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同时,两者在具体观点上又有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中国的发展应该以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为指导,同时充分吸收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有益成果。

关键词: 邓小平理论 发展经济学 比较分析

西方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虽然西方发展经济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借鉴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西方发展经济学不可能完全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许多经济发展思想和观点,形成了中国式的发展经济学。把邓小平的经济发展理论与西方发展经济学进行比较,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邓小平的经济发展理论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和相同之点。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精髓和邓小平的远见卓识。

一、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本质区别

西方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固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但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涉及很少。与西方发展经济学不同,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因而两者不仅研究对象有差异,而且在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评价标准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甚至是根本的不同。

1 研究立场不同

发展经济学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创立起来的。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从研究立场上看有不利的影响。一是利益上的冲突。许多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维护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考虑,他们或担心发展中国家过于落后引起动乱,从而使发达国家有丧失投资、市场与原料来源的危险,或出于人道主义的担心和同情,或出于大国势力的角逐,不损害发达国家的利益是他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因而他们以习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为骨架,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概念与理论来分析其发展问题,遵循西方的经济理念和道德准则来规范其经济行为,根据西方的经验教训和发展要求来构造其体制结构,这样势必忽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特点和经济利益。在这方面“西方模式论”的倾向最为明显。它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把西方的早发

模式当作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必须加以仿效乃至全盘接受的样板,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唯一途径只能是跟着它们亦步亦趋。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对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猛烈抨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利益之间矛盾冲突在理论上的激烈反映。二是认识上的偏差。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只能从外部来观察和了解发展中国家,由于知识结构和语言能力的局限,他们不可能对发展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有比较深入系统的认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他们作出客观准确的科学判断。反映在理论上,就是偏重于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偏重于用西方伦理规范或价值标准来评判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偏重于从外部条件的支持来观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等。

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从根本上说,就是立足于中国的强盛,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这一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既是这一理论的创立者,也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和主要决策者之一。邓小平是站在国家的立场、民族的立场、人民的立场提出经济发展理论的,是与祖国、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紧要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邓小平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认为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2 理论基础不同

西方发展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庞大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其结构主义、制度主义、激进主义思潮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和分析研究工具,而作为当前发展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它所依据的基本思想、理论基础则是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和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的古典主义。持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是渐进的、连续的和累积的过程,它的进展是依靠边际调节、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发展是和谐的、平稳的过程,它以自动的均衡机制为基

础,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经济发展的利益会自动地、逐步地分配到社会各个阶层。从这三点出发,必然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所要求的仅仅只是恰当的刺激、完善的市场机制和起动车自行运转的增长机器而已。有的甚至认为当代发展经济学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派生部分,是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纯粹推广与具体应用。从这一理论出发,必然否定发展的多样性,强调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单一性。如为俄罗斯经济改革提出“休克疗法”处方的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就认为,发达国家发展初期的发展机制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制是相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并无不同,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永恒的,世界统一的发展模式,这一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十分有害的。

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始终贯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强调经济发展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处于发展初期的发达国家与现在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情况和国际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历史条件、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也各不相同,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决非当今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统一模式甚至不是主要模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统一的模式。发展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各个发展中国家只有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才能够真正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就是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3 研究对象不同

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或研究范围所下的定义有多种多样,但有二个共同点,一个是没有包括或没有详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就最常用的“第三世界”概念而言,托达罗解释道:“联合国143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会员国通常集体地将自己称为第三世界。它们这样做基本上是为把自己与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世界)区分开。”这种以政治制度作为国家分类标准的作法,影响到联合国、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性组织在其文献资料中把他们所谓的“中央计划国家”排除在“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之外,也使大部分西方发展经济学教科书都只将实行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视为研究对象。另一个是没有把发展中大国单独列为研究对象。迄今为止,在传统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中,也就是那些实行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里,发展比较成功的是11个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其中除巴西外,其他的幅员和人口都极为有限,有的还只是一个城市。这表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只在第三世

界极少数并不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小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而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埃及等在内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却步履蹒跚,西方发展经济学没有对此进行过足够的、单独的研究,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不同的,一是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发达的或成熟的社会主义,而是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的发展经济学,是着眼于“不够格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发展经济学。三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其特殊性与复杂性,有着与中小国家不一样的发展难题,如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的重大影响,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运行效率,区域经济的平衡与不平衡发展的抉择,农业落后与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矛盾,内源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民族矛盾与政治团结问题等,都是发展中大国面临的特殊难题,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比中小国家复杂和艰巨得多。

4 研究方法不同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理论基础,也是指导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原则。邓小平特别注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把握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基于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最终决定作用这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必须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入手,以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和发展,从而达到社会全面进步的目的。“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在他看来,辩证法是一种世界观,更是一种方法论,由于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切忌顾此失彼,因而必须将辩证法贯穿、渗透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各个方面,力戒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结合、内因与外因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在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把改革与开放、改革与发展、速度与效益、先富与后富、发展与稳定、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都建立在了科学的、辩证统一的基础之上。

西方发展经济学主要是使用历史的、制度的、比较的和结构主义的等具体的研究方法。重视历史的、制度的、结构的因素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些因素毕竟只是经济发展诸多因素中的一部分并且还远远不是决定性因素,因而如果将这些因素的作用绝对化、极端化,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如经验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尽管十分重视历史分析,以历史的事实作为其命题,但却远远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只是一种历史归纳法甚至是历史唯心主义,他们的许多历史事实都是按照既有理论框架过滤了的或者是按照他们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去重新“解读”了的历史事实。如制度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就把制度和制度创新这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上的因素绝对化,

当作了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而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二、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相通之处

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与西方发展经济学都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都是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因而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观点上,有某些相似或相通之处。这是两者共性的地方,也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从而具有一定科学性的一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理论观点上:

1. 科技决定论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继承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强调资本积累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技术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利本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以及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都将资本积累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甚至是唯一因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受到重视,更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归于科技的进步。对欧美国家经济增长经验的研究表明,其增长有很大一部分并不能用资本、劳动、土地等物质投入去解释,产出增长的很大一部分要归于某种“余值”,这种“余值”大部分就是造成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新古典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相结合的新增长理论,更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进步)作用的结果,强调加强对人力资本、知识外溢、边干边学、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等的研究,从而进一步确立和深化了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研究表明,正是由于缺乏人力资本投资和科技进步,而不是由于缺乏物质资本投资,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孕育和促进了知识经济的来临,并构成了知识经济的核心内涵。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10年以后,在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关键时期,他总结当代新科技革命的经验,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科学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从哲学高度上解决了当代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指出了一条依靠科技进步加速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道路,这就是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的真理性已经和正在为知识经济的兴起所印证。知识经济就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以知识为主要内驱力的经济形式,作为一种影响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总潮流,它的兴起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证明了邓小平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深刻预见性。

2. 农业基础论

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忽视了农业问题,当时流行的刘易斯的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式就是理论上不重视农

业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它只强调工业部门的扩张,认为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仅限于为工业扩张提供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重工轻农的结果,是工业产值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农业产值的增长速度长期在1%以下,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了“农业危机”。到70年代中期,重工轻农思想带来的严重后果,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农业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就业、绝对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的加剧,发展目标多元化了,不仅经济增长,而且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和分配平等都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目标,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才对农业发展本身加以重视,不再把农业看作工业化的附庸,承认了农业和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现在发展经济学家对农业的共识是,农业对经济发展能作出多方面的贡献,如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尤其是资本贡献被认为最为重要。

邓小平历来重视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的经济发展问题,一贯坚持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在改革初期,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一直坚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邓小平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问题的,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他告诫全党要“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他还特别重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关系,强调城市和工业要为农业服务,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

3. 制度创新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启示,吸收并运用制度结构的研究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他们认为经济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率的政治经济制度,如产权制度;提供公共物品的部门过于单一,缺乏竞争机制,不利于人们在制度创新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权力过于集中,一旦决策失误其影响是全局性的,损失巨大;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扭曲了价格信号,妨碍了公平竞争。他们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需要有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外,还必须进行相应的、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体制、制度的变革,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变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比资本积累更为重要。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诺思认为,除非现行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并特别指出,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目前阶段,制度创新的基本问题是经济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认为,这一革命与过去革命的性质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只有通过制度创新,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从农村到城市,从微观组织到宏观体制的改革,包括产权制度、企业制度、运行程序、法律规则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无

疑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邓小平对制度创新的内涵与方式也作了符合我国实际的科学的界定,进行了新的探索。他认为,制度创新是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制度创新,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进行,创新的目的也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制度创新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础上的创新,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制度创新是对旧制度包括传统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创新,要科学总结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要科学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益的东西,但不等于全盘西化,不能照搬照套、盲目模仿,产生新的迷信和教条;制度创新具有实践性、历史性的特点,不可能一蹴而就,有革命式、非连续式的制度创新,但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性质而言,更多的是渐进的和连续式的制度创新,应该走渐进改革之路;制度创新是探索性、创造性、有风险的创新,是摸着石头过河,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鼓励探索,允许失败。

4 市场导向论

根据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社会发育不成熟、资金技术和管理人才严重缺乏等原因,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国家经济计划和直接管理来推动工业化和促进经济增长。但对战后计划化历史的检验表明,经济发展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失败多于成功,除短期之外,绝大多数国家甚至都没有实现它们计划中的中等的收入和产出目标,更为麻烦的是,当这些国家继续实行计划时,情况不是好转而是变得更加糟糕。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批评了国家干预,特别是高度集中计划管理的不足之处,具有代表性的是拉尔。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应当是市场—价格机制,而不是计划管理机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价格机制对促进增长、促进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约翰逊则认为,市场机制不仅具有静态效应,有利于资源配置,而且还具有动态效应,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刺激,有利于经济发展,因而市场机制是经济发展的工具,经济发展必须取市场导向。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与性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在总结世界经济发展实践,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真理。邓小平的非凡之处在于,他依据经济发展的实践,提出了计划、市场与社会制度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从而确认了它们作为“手段”和“方法”的性质。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就世界范围看,几十年来的发展实践表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比以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的经济体制运行效率更高,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而邓小平指出,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5 不平衡增长论

在早期发展经济学中,对于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曾有

过激烈争论。以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和刘易斯为代表的平衡增长论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在整个工业或整个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工业内部或国民经济各部门按同一比率或不同比率得到全面发展,才能够摆脱贫困落后状况,实现工业化。以赫尔希曼为代表的平衡增长论者则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源稀缺,资本有限,要在短期内筹集到大量资本并解决资源稀缺的“瓶颈”问题是不可能的,因而平衡增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不足取的,也是不现实的。赫尔希曼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首先发展一部分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后来的研究表明,平衡增长理论与不平衡增长理论之间并无根本性的矛盾,不平衡增长的决策是以创造短期的、事先的不平衡,来求得长期的、事后的平衡,平衡增长是目标,不平衡增长是手段。发展初期的不平衡增长,正是为了实现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较高层次和较高水平的平衡增长。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特定运动形式,都要经过量的积累之后产生质的飞跃,因此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是呈波浪式发展的。邓小平运用发展不平衡规律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从产业来看,他提出了基础产业优先论,指出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技术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环节、薄弱环节、关键环节,因而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从空间来看,他提出了地区发展不平衡战略,指出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发展得快一些,“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4]这一战略思想包括一个“大政策”和一个“大原则”。“大政策”就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原则”就是逐步实现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6 对外开放论

早期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大多有内向发展战略倾向,其理论基础是贸易条件恶化论和幼稚工业保护论。根据这一理论,早期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一战略实施结果并不理想,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出现了国内市场狭小、外贸逆差扩大、外汇短缺、农业萎缩、失业严重、增长缓慢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家中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重视对外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视,外向型发展战略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据了优势。特别是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他们批评了早期的伪装失业、贸易条件恶化的长期趋势、有害的示范效应、贸易悲观主义等,抨击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并以“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的成功为佐证,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面对一个空前开放的世界,面对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机遇和严峻挑战,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透彻分析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问题提出来。他指出:“总结历史经验,

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⁴¹并鲜明地提出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理论,主张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而且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不仅对发达国家开放,而且对发展中国家开放;不仅沿海地区要开放,而且沿边地区和内陆地区也要开放;不仅主张对外开放,而且强调要把它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改革和开放扫清了障碍,使中国迅速打破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

7. 后发优势论

在世界现代史中,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情况不乏其例。与先进国家相比,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似乎都处于劣势的后进国家为何能在不长的时间里赶上先进国家呢?发展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长期的、多方面的探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式和假说,其中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后发优势论”。如格申克龙的大冲刺理论,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钱纳里的经济结构变化与工业化理论,阿伯拉莫维茨的追赶假说等。这一理论强调后发展的某些内在的优势,如有的强调技术进步的扩散作用,有的强调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作用,有的则强调后进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变。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是同时并存的,围绕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相比谁占支配地位从而发展中国家能否赶上先进国家这个核心问题,西方发展经济学形成了强调后发优势的乐观派和强调后发劣势的悲观派两个阵营。悲观派认为后发劣势居支配性地位,从而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乐观派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就一定能够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且后来居上,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邓小平一贯持乐观态度。他认为,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展自己,就一定能够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设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时,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但他同时深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进入开放、一体化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避免一切“从头开始”、“重新开始”的时间耗费,并能以发达国家的先进成果为起点去创造更新的未来。他指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世界形势,是发达国家在早期发展中所不具备的,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优势,它使我们充足的时间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自己。我们有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引进、模仿、创新,有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经验,特别是一百多年市场经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有大量的外资可以利用,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后来居上,并且正在后来居上。“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总是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⁴²,就是邓小平面对20世纪90年代国际国内“机遇与挑战并存”形势作出的战略决策,这就是一种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实施追赶型战略的发展决策。

8 可持续发展论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认真总结自己

的发展历程,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社会活动与发展行为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之上;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是,既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衡量可持续发展主要有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的指标,缺一不可。托达罗分析了人口、资源、贫困、经济增长、农村发展、城市化及全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格里芬则进一步指出,在发达国家,环境问题是物质丰富、社会过快发展以及对物质产品和服务没有节制的需求的结果,而在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则是贫穷的结果,发达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在贸易、债务、资源分配等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必要的帮助。

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他的发展战略实质上已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大持续发展”是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可持续发展最初是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引伸出来的,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肯定保护环境重要性的同时,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角度论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扩大了可持续发展的外延和内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持续发展观,包括人口、资源、环境要协调发展,农业、能源、交通、科技要协调发展,沿海、中部、西部要协调发展,效益和速度要协调发展,以及两个文明要协调发展等等。这一发展战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整体发展战略,它既区别于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的“经济中心型”发展战略,又区别于脱离生产力发展要求、片面地变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那种社会发展战略,是一种经济与社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综上所述,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与西方发展经济学既有本质的区别,又在某些具体观点上有相似或相通之处。正是这些差异和不同,体现了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不同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卓越之处,并由此决定了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而不是西方发展经济学或别的什么理论,构成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同时,也正是由于存在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要求我们必须把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看作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时刻关注世界经济的发展,注重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充分吸收西方发展经济的有益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经济学。

注释:

10 11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383、2~3、77~78、237、148、377、375~376、78、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文版,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邓小平文选》,第2卷,87、4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J)